

实现农产品出口为主 向制成品出口为主的转变

——福建农村经济的发展道路

许经勇

福建农村经济，同全国其他省市的农村经济一样，从总体上来说，都是在同一的政治与经济方式的支配下运行的，因而，具有大体共同的演变规律性；但是，与全国许多省市的农村相比较，福建农村又是地处祖国东南沿海，其海岸线居全国第二位，具有超前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极为有利的条件。这就决定了福建农村经济的发展，必然具有它所特殊的规律性。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不论是农业问题、农民问题，还是农村问题的最终解决，都是和我国由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度成为先进工业国这个根本任务的完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只有把农业问题、农民问题、农村问题放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来考察，才有可能正确地掌握它的发展规律，寻找切实有效的解决途径。对于不发达的国家来说，其经济发展几乎都经历了进口替代阶段。即强调替代以往进口的国内经济活动，并把它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由于不发达国家过去进口的，大部分是工业品，故这一战略有时也被称为“替代进口工业化”。这个战略具有双重号召力：即由国内生产的以前要花外汇购买的商品，有利于缓和国际收支不平衡，并且由于这些以前进口的商品，大部分是工业性的，因而有利于促进国家工业化。

我国是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的基础上，开始国家工业化建设的，再加上工业化初期（即五十年代）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国际市场封锁，在这严酷的国内外条件下，我国选择了一条以面向国内市场为主要目标的工业化道路，即进口替代工业化道路，也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可能被认为是唯一可行的选择。但是，由于重工业倾斜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持续的时间相当长，必然带来较为严重的消极后果。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部分剩余农业劳动力长期滞留在农村。从经济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历史进程看，国家的工业化和农村劳动力向工业与城市的转移，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工业和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吸收程度，是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但由于我国选择了重工业过度倾斜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再加上以后长时期没有处理好重工业与轻工业、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的关系，使农村长期停留在传统农业的状态，大量剩余农业劳动力长期沉淀在农村。这是因为，大型重工业是属于资金密集型产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很弱，它造成我国城市庞大的待业劳动队伍，更谈不上大量吸收农村剩余农业劳动力。这是我国农村劳动生产率长期处于低下水平的根本原因；二是国家工业化所需要的大量资金，主要是由农业部门来提供。既然当时我国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重点，放在重工业上面，而重工业的生产周期又特

别长，资金周转相当慢，所需要的投资量很大，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把为工业化积累资金的担子，重点落在农业身上。在我国的工业化初期，农业为重工业所提供的积累，在社会总积累中所占的比重是很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创造资金积累的主要承担者。一个国家原有的经济发展水平愈低，重工业的发展速度愈快，农业部门所承受的这个任务就愈艰巨。为了肩负起历史所赋予我国农业的特殊使命，必然要求农民要以较低的价格向国家交售农产品，为国家工业化积累资金作出巨大的贡献。这就势必严重地削弱了农业扩大再生产能力。

在进口替代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战略的支配下，我国、我省的农村经济必然是以农业为主体成分的近乎封闭型的区域经济，它们同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一般是通过农产品统购统销这条国家渠道，商品的交换被局限在相当狭小的范围内。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之间，彼此很少发生内在的、广泛的、积极的联系。面对这种二元化的经济格局，城市较高程度的社会分工同农村较低程度的社会分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尖锐的矛盾。从而使得整个国民经济缺乏应有的活力。对于我国或我省来说，无论是城市经济或者是农村经济，要能够得到根本性的改观，都有赖于从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转变。

在进口替代工业化过程中，为了支付进口技术设备和原材料等费用，农业是提供出口产品，取得外汇来源的主要部门。在通常的情况下（少数产矿国除外），一个国家的经济愈不发达，农产品出口就愈重要。这不仅因为通过出口农产品，可以换回现代技术装备，促进国家的工业化，同时因为根据比较利益原则，对经济不发达国家来说，出口农产品比出口制成品是一种优势。它除了可以保证农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还可以通过农产品出口贸易，作为经济增长的一种动力。这是近年来我国农村，特别是沿海地区农村，强调发展创汇农业的重要原因之所在。我们的国家，所以把沿海地区（如福建、广东）作为发展外向型经济、发展创汇农业的重点地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沿海比内地具有更为发达的文化条件、交通条件和市场条件，有利于提高农业经营集约度，同时也说明了，要加快我省山区经济的发展步伐，就必须把完善交通设施以及改善市场条件与文化条件，摆在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

这里必须着重指出的是，以初级农产品出口为重点的对外经济关系，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我省农村的经济面貌的（这并不排斥小范围内的特殊情况——如少数颇具规模经营的对虾基地）。与此同时，还必然会面临着一系列难以摆脱的困境。首先表现在，与制成品相比较，农产品的收入与价格需求弹性是比较低的。在国际市场上，农产品价格的波动幅度所以特别大，是因为农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与价格需求弹性，通常都是小于1。农产品收入需求弹性小于1，意味着总收入水平每增长10%，对农产品需求的增长，通常是小于10%。即随着经济的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相对而言，对农产品需求的增长，是愈趋缓慢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我省的农产出口方向，主要是高收入的国家 and 地区（如日本、新加坡、香港等），而对于这些高收入国家和地区来说，居民对多数农产品的需求弹性是很低的，或者说，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对农产品需求量的增加，高收入国家或地区比低收入国家要弱得多。还有，在国际市场上，农产品供给的增长，将迫使农产品价格的下跌。同时由于农产品价格需求弹性，通常是小于1，因而通过降低农产品价格，所能引起的追加需求，可能会带来比以前更少的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盲目遵循比较利益原则，不断扩大农产品出口规模，就有可能使市场价格下降到总收入减少的程度，从而，使农产品出口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前我国、我省的农产品市场，基本上是属于卖方市

场，而国际农产品市场，则基本上是属于买方市场，这就等于出口农产品的流向，是从需求较强的市场，流入需求较弱的市场，这就有可能造成收购时抬高价格，销售时不得不压低价格。同时为了完成农产品出口创汇计划，唯一的办法是持续地扩大农产品出口量。至于这些出口农产品的换汇效益，则往往被放在极其次要的地位。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加剧了国内市场农产品供给的短缺，另一方面又会较大幅度地提高换汇成本。

其次表现在，作为农产品生产的最基本生产资料的土地，是属于非再生资源，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其稀缺性将是愈来愈尖锐。这对于人口密度较高的我国、我省来说，更是显得特别突出。我国人均占有的耕地资源，只相当于世界各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我省人均占有的耕地资源，只相当于世界各国平均水平的七分之一。从长远的观点看，农产品出口并不构成我国、我省的优势。一个无须掩盖的客观事实，即我国、我省目前所出口的农产品，很大一部分是依靠紧缩国内市场需求，是从国内居民的消费中挤出来的。而我国、我省农产品（包括畜产品、水产品）供给偏紧的情况，在今后的一个相当长时间内，都是很难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的。今后要想继续限制国内居民的消费，要想挤出更多的农产品出口货源，只能使已经形成的“菜篮子”包袱越背越重，并将会遇到越来越大的阻力。

再次还表现在，我国、我省低水平的粮食占有，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创汇农业的发展。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与其他产品相比较，粮食产品是一种社会效益极高的产品。如果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则是基础的基础。粮食产品具有其他产品所不可比拟和不可替代的特殊使用价值，是人民生活所必需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消费资料。此外，粮食价格又是市场一切商品价格的基础和核心。粮食供求一紧张，粮食价格一波动，就必然连锁反映到各个方面，严重地威胁着市场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我国、我省粮食所面临的形势是：一方面是需求量不断增长，另一方面是供给量受到很大的限制。就全国来说，到本世纪末，要维持1984年曾经达到的人均占有粮食近400公斤（满足温饱）的水平，还得增加1000多亿公斤，平均每年须增加100亿公斤（超过1980年至1988年的平均增长速度），这在每年减少500万亩耕地的情况下，是很不容易达到的。如果再考虑由于居民食物构成的变化所引起的对粮食的更大需求量，粮食的供求形势还会显得更加严峻。目前我国每年须进口150亿公斤左右的粮食，其进口量仅次于日本和苏联，居世界第三位。就福建省来说，1987年全省粮食总产量83.9亿公斤，人均占有量只有300公斤，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2%，全年调入粮食18.7亿公斤。到本世纪末，按人均占有粮食400公斤（温饱水平）计算，全省粮食需求量将达到128亿公斤，其缺口量将突破40亿公斤。在国内粮食偏紧的情况下，我省沿海地区创汇农业正面临着如下的窘境：即如果不利用国际粮食市场来缓解粮食需求压力，创汇农业就很难迈开新步子；但要从国外进口粮食来支持创汇农业的发展，不仅要受外汇短缺、港口吞吐与运输能力的限制，还要承担因降低粮食自给率所带来的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说，粮食问题已经成为我国、我省发展创汇农业的最大制约因素。我们对我省创汇农业的发展潜力，切不可期望过高。

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农村来说，以出口初级农产品为主的对外经济格局，说到底，只不过是替代工业化的产物，它仍然没有从根本上突破内向型经济的模式。以往的历史经验告诫我们，用出口农产品所获得的外汇收入，来维持进口替代工业所必需的资本投入品的购买支付，一旦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会形成进口替代与外汇短缺之间的恶性循环，使替代工业

目标遭受挫折。面对这种情况，通过调整出口产品结构，逐步用劳动密集型产业制造品来代替初级农产品出口，便是从根本上摆脱不利的贸易条件，促使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转化的重要途径。这就必须由进口替代工业化转变为促进出口工业化，把增强农村新兴工业部门的生产能力，作为发展出口产业的优先顺序。

在我省农村对外经济关系上，逐步地把贸易的重点，从初级农产品转向加工制成品，并不象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容易，因为它必须停止长期执行的特殊保护政策，把国内的产业（这里主要指乡镇企业）抛向优胜劣汰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但是，如果这种转变有可能获得成功，并使内向型经济最终转化为外向型经济，则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首先，我省近几年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引起消费的过度膨胀，大量进口技术设备和原料，又会使外汇缺口扩大，从而迫使出口愈来愈多的初级农产品。但由于初级农产品的换汇成本，显著地高于工业制成品，即用廉价的初级农产品，去换取昂贵的国外技术设备和中间产品，难免就会出现巨大的外贸逆差。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在经济发展初期所碰到的这个棘手问题，就必须乘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调整产业结构的机会，把我省沿海一带的制造业，尤其是乡镇企业的一部分，抛向国际生产消费的循环中去，并通过广泛吸收外资、港资和台资，大力发展两头在外的出口产品，努力增加外汇收入。这种面向出口的产品生产，只要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就可以逐渐做到使外贸收支剩余，变逆差为顺差。同时，这对当前缩小国内投资规模，控制消费与通货膨胀，都将发挥一定的作用。

其次，对于拥有大量非熟练劳动力的我省农村地区来说，其比较利益在于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在外向型经济的环境条件下，如果某些产品使用投入品的比例，同本国的天赋要素相差太大，这些产品是根本不可能在国内生产的。因为在比较利益原则的作用下，几乎所有在国内生产的产品，都具有合理的密集度。对于劳动力充足的我省来说，进口替代（即内向型经济）促使其提高资本密度较高的商品的生产水平，而在外向型经济的环境条件下，从比较利益原则出发，这类商品是不会被生产的。在实行进口替代的国家和地区，其被保护的产业的资本密集度，会高于可出口产业的资本密集度，也会高于在自由贸易下能够保持竞争力的进口竞争产业的资本密集度。对于农村劳动力极为充足的我省农村来说，从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的转变，从内向型经济到外向型经济的转变，意味着其产业结构将向着投入更多活劳动的方向变动，这就会扩大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缓解我省农村长期存在的就业压力。

再次，恩格尔定律表明，要使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获得较大幅度的增长，就必须将资源逐步地从农业转移到二、三产业。我省农村经济长期不发达，固然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而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存在着技术落后的传统农业与微乎其微的家庭手工业；同时，在我省农村居民赖以生存的主要部门——即农业部门中，劳动力过剩的现象又特别严重。由于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其经济主要依靠低下劳动生产率的初级农产品，而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地区，其经济主要依靠较高劳动生产率的二级产业产品，所以，与城市经济相比，农村经济总是显得特别落后。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我省农村经济长期所处的这种不利地位，就必须在农村地区就地发展加工业和其他产业。因为二、三产业的边际产出，必然会超过农业；把一部分劳动力从农业转向二、三产业，会显著地增加产出。当农业中还存在着变相的失业（即劳动的边际产品趋于0），从农业转移到二、三产业的劳动者，其任何水平的

产出，总比滞留在农业要强。如果不能实现资源的逐步转移，对农产品需求就会相对放慢，农产品生产就可能变得相对过剩。即使农产品与制成品的产出，都以同样的速度增长着，由于农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较低，贸易条件乃会变得较不利于农产品生产。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制造业产品价格来说，农产品价格必然呈下跌的趋势。〔这几年我省农产品所以供不应求，市场价格（指非计划供应部分的产品价格）所以会猛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村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流动。〕面对这种情况，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村经济面貌的改变，就应当逐步实现农村由生产与出售初级农产品为主向生产与出售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以及最终实现由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的转变。

最后，发展出口加工业，其着眼点是废除在进口替代政策下，国内各产业（包括乡镇企业诸产业）所享受的各种形式的保护措施，让它们公开地暴露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而市场竞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是质量高、消耗低、价格廉，这就会迫使我省农村的非农产业，即乡镇企业，尽快地采用国际先进技术，把生产力和经济效益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

当然，由于我省农村以往对外贸易的依赖性甚低，即自给性部分甚大，这就决定了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业（这里主要指乡镇企业），把我省农村的内向型经济转化为外向型经济，乃需要经历很长的时间，即使是沿海开放区和闽南三角地区，也是如此。对于实现这种转化所面临的复杂性与艰巨性，我们必须有个清醒的认识。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开放的二元经济转变时期，其政策演变必然经历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先是进口替代阶段，后是出口导向阶段。在进口替代阶段，其经济战略的基本要旨是：通过政府投资来推进经济的增长。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被广泛地用来支付“赤字财政”，并通过压低原料价格和压低利率，来协助国内企业“制造利润”。实现进口替代阶段向出口导向阶段的转变，必然意味着“经济的自由化”，以及交换行为的规范化，逐步摆脱政府直接控制为主的局面，并不断地完善市场机制。从发展的趋势看，随着我省农村由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的转变，其组织形式也必然要跟着发生相应的变化。因为经济关系的日益复杂化，凭借着政治权力强行指令的做法，迟早总是会遇到麻烦的。而为了取得较高的经济效率，经济决策的分散化，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就必然要和传统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相抵触。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为什么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在由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转变过程中，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阻力，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反复，而只有亚洲少数国家和地区（俗称“四小龙”），才会取得政策的一贯性演变，和举世公认的经济增长成就。这就必须探讨它们起步阶段的始初差别（包括资源条件、交通条件、市场条件的差别），以及在长期演化过程中所采取的不同制度与政策。同时由于政策的变化是通过政治程序来进行的，所以，这种研究还必须超出经济分析的范围，把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综合起来加以考察。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

（上接第35页）

厂长、书记（处长）、工段长、班组长、党团小组长等进行奖励。

厂政研会积极开展活动，注重调研，坚持从实际出发，勇于开拓，在引导和设计我厂思想政治工作新格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厂政研会连续两年评为省先进单位。

（执笔：蔡力强）